全球對話 2.5

Global Dialogue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社會學作為志業

Zygmunt Bauman

認識 Izabela Barlinska

芝麻街

Tamara Kay

Rio+20

Herbert Docena

> 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 烏克蘭的女性主義
> 日益危險的拉丁美洲
> 哥倫比亞的黑人中產階級
> 俄羅斯社會學的真實情況
> 撙節時代的英國社會學
> 橫濱世界大會
> 義大利的大學拍賣中
> ISA和聯合國：犯罪和法律
> 移民的死亡陷阱
> ISA的eSymposium徵求編輯

第二卷 / 第五期 / 2012.8

GDN

> 主編的話

社會學作為一種志業

Max Weber在1917年和1919年跟Munich的學生演講「政治作為志業」和「學術作為志業」。他將畢生的政治學術經驗濃縮為兩篇演講，闡述了志業的社會學概念，不過卻沒有討論社會學如何作為志業。全球對話承襲了Weber的理念，將討論此一主題。

這期我們以Zygmunt Bauman的文章開場。他並不贊同Weber筆下學術與政治的二分。對Bauman來說，學術因為管理的緣故和政治走的太近，而政治似乎又和權力脫了鉤。 社會學必須超越學術和政治的分野，進一步和公眾建立起雙向的對話。

這樣的對話正是波蘭社會學家Izabela Barlinska所說的波蘭公民社會和團結工聯當年的行動主義。Tamara Kay對於芝麻街在全球各地的政治文化實踐也是另外一個很好例子。Koichi Hasegawa則促使日本社會學去公共性的討論核災之後的種種議題。而長期以來女性主義就不斷在促使女性弱勢和邊緣話議題的公共討論，而Tamara Martsenyuk便是描繪了烏克蘭女性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Herbert Docena則分析了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Rio+20)中科學和政治的相遇。科學家盡可能保持中立以好取得利基，而這卻也正是Bauman所反對的。

這個年代—Bauman筆下所謂的液態現代性的年代—特別需要對話。我們收錄的文章就是這樣的努力，包括了拉丁美洲的不安全感(Kessler)，非裔哥倫比亞人的種族主義後果(Vigoya)，聯合國處理針對移民的暴力(Barbaret)，以及美國如何製造暴力(Elcioglu)。Romanovsky和Toshchenko討論的新的俄羅斯社會。最後，如同Corradi所描述的義大利個案，危機讓大學的師生走入絕境。社會學長期以來就是在描繪這種不安全感，然後這種不安全也帶來了社運，也帶來了一絲希望。

未來就像是「寒冷無垠的黑夜」，總是讓人悲觀。Weber在德國一次大戰戰敗之後，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仍然懷抱著希望，期待將不可能轉化成可能。社會學最崇高的一項使命就為了樂觀地努力達成那些不可能的任務，諷刺的是，不可避免地政治還進入學術，並將學術帶入政治。所以我們會看到今天Weber和Bauman加入了這個對話。

全球對話一年發行5期，以13種語言刊出。請到ISA網站上可閱讀全文。投稿請寄給：burawoy@berkeley.edu

論社會學作為志業：這期我們將開始連載一個新專欄。Zygmunt Bauman將在液態現代性的脈絡下討論社會學如何作為志業。

認識Izabela Barlinska：Barlinska的訪談中會有她關於她身世的故事，如何離開波蘭遠走他鄉，如何和團結工聯結識，如何加入ISA。

全球芝麻街的在地兒童教育：Tamara Kay分析芝麻街—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兒童電視節目—如何在各個國家受到歡迎。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Fatemeh Moghaddasi, Saghar Bozorgi, Nastaran Mahmoudzadeh, Najmeh Taheri, Tara Asgari Laleh, Milad Rostami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姫野宏輔, 高見具広, 岩舘豊, 池田和弘, 福田雄, 三部倫子, 佐藤崇子, 小川翔平, 井出知之, 堀田裕子, 小坂有資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Michał Chełmi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uller, Wojciech Perchuć,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俄國: Russia: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Mustafa Aykut Attar.
媒體顧問: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社會學作為志業 2

液態現代性下的社會學志業
by Zygmunt Bauman, 英國 4

認識Izabela Barlinska
訪問ISA執行秘書, 西班牙 6

> 協商未來

全球芝麻街的在地教育
by Tamara Kay, 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 10

科學的立場：聯合國Rio+20會議
by Herbert Docena, 菲律賓 12

> 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by Sylvia Walby, 英國 15

烏克蘭的女性主義
by Tamara Martsenyuk, 烏克蘭 17

> 拉丁美洲的階層化

日益危險的拉丁美洲
by Gabriel Kessler, 阿根廷 19

哥倫比亞的黑人中產階級
by Mara Viveros Vigoya, 哥倫比亞 21

> 國家

俄羅斯社會學的真實情況
by N.V. Romanovsky and Zh.T. Toshchenko, 俄羅斯 23

撙節時代的英國社會學
by John D. Brewer, 英國 25

橫濱世界大會：連結更平等的世界
by 長谷川公一, 日本 26

義大利的大學，拍賣中
by Laura Corradi, 義大利 28

> 特集

ISA和聯合國：犯罪和法律
by Rosemary Barberet, 美國 30

移民的死亡陷阱
by Emine Fidan Elcioglu, 美國 31

對ISA的eSymposium感興趣嗎？
by Jennifer Platt, 英國 32

> 論液態現代下社會學如何作為志業

by Zygmunt Bauman, Leeds University, 英國

英國社會學會長John Brewe介紹Zygmunt Bauman。Leeds, 2012年4月。

Zygmunt Bauman毫無疑問的是當代非常著名的社會學家。Bauman於1925年在波蘭的Pozna　出生，然後接下來有好幾年的時間裡他一直是位共產主義者。後來他成為Warsaw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到了1968年因為反猶主義的焰氣高漲，他被迫離開家鄉波蘭。1971年時Bauman成為了Leeds University的終身社會學教授。在80年代和90年代，Bauman出版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現代理性、史達林的屠殺、以及理性主義面對外來者的無能為力，也因此博得聲譽。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一書中處理了知識分子如何受困於理性泥沼以及如何從中逃離的議題。他早期的作品著重在批判高度現代性——種現在他將之稱為階層和管制的固態現代性；晚期則把重點放在液態現代性上。液態現代性，顧名思義，意味著一種前所未有的不確定與不安全。Bauman著述豐富，眼光獨具，影響力深遠，所以擔綱我們「社會學作為一種志業」新專欄的第一位作者，他是不二人選。

固態現代性的顛峰時期誕生於一百年前的西方世界，全心致力於擺脫舊時代的不確定與沒落，瘋狂地追求現代化。此時，社會學成為了大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大家從管理的角度都期待他可以為社會帶來新的秩序。百年後的今日，社會學成為了顯學，半推半就地讓自己更有用、更有立足點，好符合當今掌權者的管理需求。社會學的術語或論證或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是教學與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卻沒什麼差別。如此一來，社會學越來越不用背負改變社會的責任。這，是社會學失敗所在。正如同像是Michael Burawoy等慧眼獨具的社會學家曾經警告過我們一樣：這樣的失敗讓社會學脫離了現實的社會。

社會學在學術象牙塔中被保護得很好，對於外界要求其挺身而出、扮演緊急重要角色這樣的訴求，社會學總是可以置身事外。由於體制中的制式程序，像是畢業、升遷、人員輪替、招募新人、再生產等，社會學可以一直依附著這樣的制度形式。而當今的世界變遷迅速，

>>

公眾對於這種制度的要求越來越少時，上述的情況更加明顯。而這也意味著：當大眾對於改變舊制度的要求日益增加、舊有管理與科技的制度逐漸成為歷史時，因為社會學實際上有能力提供一種新制度的想像，所以這和社會學仍然依附於舊制度的情況，有著很顯著的落差。今日的世界越來越去管制化、私有化、以及個人化，所以對於新制度的要求可說是非常迫切，但是卻也相當匱乏。新制度的該被應用到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生活政治」之中，讓人們可以找到如Ulrich Beck所言的「社會問題的個人式解決辦法」。這也是液態現代中人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學因為要回應某種管理的需求，總是試圖想成為一種「研究不自由的科學/科技」：理論上來說是在研究社會，但實際上來說是在解決Talcott Parsons所提出的霍布斯問題，亦即，怎麼在一種模糊自由意志的祝福/詛咒之下，引導/強迫/引誘/教育人類去服從社會秩序、聽命於管理和監控階層的命令呢？或是，如何去調節自由意志和服從權威，以致於傾向成為La Boétie所說的志願奴役？簡單說，就是如何讓人們甘願服從？

在當代，由於管理革命(包括管理者將他們的管理工作附屬於那些被管理者)，社會是一個個體化的社會。因此，此刻的社會學有了絕佳的機會去進行轉型：轉形成為「研究自由的科學/科技」：去探討在理論上受到命運操控的個體如何成為在實際意義上自主的個體；或是借用Jefferey Alexander的話來說：社會學的未來(至少是不久的將來)取決是否可以轉型為致力於人類自由的文化政治。

如何達成此一目標？策略為何？我想，方法在於要持續不斷地跟社會行動者的知識進行對話(這對於舊時管理思維的社會學來說，這種知識是不具認知上的意義，且要被揭露、剷除、矯正的)。而這點也在Richard Sennett最近談論到人本主義的文章中得到進一步的闡述：非形式化，開放，合作。非形式化(informality)是指對話的規則並不是事先訂定的，而是在對話過程中浮現。開放(openess)指的是對話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會宣稱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而企圖去說服其他人(那些見解錯誤的人)。合作(cooperation)意味著對話的所有參與著同時是老師也是學生，沒有誰是贏家或輸家。總之，忽略這些原則的代價，就是社會學將變得無關痛癢。

社會學過去宣稱要去掀開社會的神秘面紗並且掌握社會運作的肌理，而今，社會學正處在一個如Hull University的Keith Tester所說的過渡時期：舊思維慢慢地被認為不再適合，可是新思維卻又還不到取代前者的地步。這是一個幾乎所有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但是成功機率都很小的時代。我認為，這個前提之下，任何提出預測人類命運的方案都是不負責的和有問題的，因為想要碰觸到液態現代性問題的根本，基本上是緣木求魚，而且我們解決或檢視問題能力的缺乏，基本上就是這個問題的前提。

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得因此放棄嘗試，而是我們要把所有的嘗試都視為只是暫時的：在宣稱我們找到最終解答之前，或是宣稱這個志業已經被徹底實踐之前，我們永遠都需要更多的嘗試。■

> 認識 Izabela Barlinska

相信大家對Izabela Barlinska都不陌生，而她也認識ISA裡的每一個人！Izabela是一位有條不紊卻又不失創意的人，說起話來輕聲細語，但語氣卻非常堅定。他的人生有35年的歲月都奉獻給了ISA了！此外，Izabela還精通多國語言，包括英語、法語、西班牙與、俄語、波蘭語。她，就是我們ISA在Madrid總部的秘書，總管各種大大小小的事務。她有另外兩名助理Nacho和Juan。從帳務、會員、協調建議各個委員會、各種會議等等，這些都是Izabela的業務。每一位副會長和會長都要跟她請教，借重她的知識、智慧、與經驗。

Izabela從1987起擔任ISA的執行秘書。在她任內，ISA可謂蒸蒸日上，會員人數從1200人增加為現在的5000人，並有55個國家會員和55個研究委員會。她初次與ISA結緣的時候還是個在Warsaw的學生，然後隨著ISA從加拿大到荷蘭，輾轉再到西班牙。這段期間她不但完成了博士輪文，還以西班牙文出版成冊，叫做Civil Society in Poland and Solidarity。她在波蘭反對運動的經驗中學到了如何在各種棘手的情況中保持冷靜與緘默，使得她能勝任這份在ISA的職務。Michael Burawoy在2011年9月27日於Madrid訪問Izabela。訪談的第一部分是關於她離開波蘭並接觸到ISA的心路歷程，刊登在本期

Izabela Barlinska，旁邊的是Juan Lejarraga。攝於ISA秘書處，Madrid的Complutense University

>>

。第二部分是關於他在當了ISA執行秘書之後，與ISA從擴張到穩定的種種經驗，這部份將在下期刊出。

布：Izabela，妳當初是怎麼接觸到ISA，並擔任這份有趣卻責任重大的工作的？

伊：嗯，我想這真的是我人生中的意外插曲。我的阿姨Magdalena Sokolowska應該是個關鍵的人，因為她在1977年時是ISA執委。還記得那時候正值春天，我正在Warsaw大學忙著準備我考試。有天，我阿姨她突然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可以幫她一個忙，就是跟著她兩三天，去辦一場國際研討會。你知道的，通常這時候總是需要一位「小女孩」幫忙處理接機、接送、行李遺失等等這種事情，所以那就是我了。

布：為什麼她特別找妳幫忙呢？

伊：我想是因為我會說俄語和英語，而且我又正好找得到。不過時我正在準備考試，所以有點左右為難。不過我爸跟我說我一定要去，沒有理由拒絕。我想即使一個人到了20歲了還是得聽父母的吧！所以接下來的幾天我就是都待在機場裡面。我想說的是，那可是波蘭哪，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而且當時情勢很艱難，也沒有人會說外語。所以我就是整天坐在機場，然後邊看書準備考試。不過當時的執行秘書Kurt Jonassohn和Céline Saint-Pierre似乎注意到了我，就說他們將在明年的夏天，在瑞典的Uppsala舉辦ISA的世界大會，他們希望邀請很多東歐的學者參加。因為我會俄語，所以他們覺得我應該會有興趣參與這份工作。

布：那真的是個非常吸引人的邀請哪！

伊：沒錯！想想看，可以到瑞典工作一個月，這多讚啊！我想都沒想的就點頭答應了。我當然想去！後來我去了，是當時的會長Ulf Himmelstrand (1978)去碼頭接我的。我用最便宜的方式到瑞典，這個方法就是搭船走波羅的海。後來我就在瑞典做大會的準備工作，之後我被正式安排到大會中的一個職務，並分配到一張桌子，那桌子叫做總諮詢處。

我想沒有任何的事情的起頭會比這個還要更棒的了！其實那時候我對ISA並不熟悉，而在做的事情也只是像是幫一位老奶奶找她的孫女，而這個孫女可能跑去Stockholm玩了的之類的。總之就是你可以想像到的任何總諮詢處要處裡的任何雜事就對了。不過顯然我表現得應該不錯，因為後來Kurt Jonassohn和Céline Saint-Pierre又希望我可以去幫忙1982年在墨西哥的大會，並先在1981年底到Montreal。沒錯，我又再一次得到一個令人興奮的工作邀約！半年的時間在Montreal，並且有獎學金，這多麼吸引人啊！所以我後來就開始申請護照。你曉得的，在共產國家要申請到護照並不容易，不過最終我還是拿到了。

布：那時是團結工聯的時代，波蘭正處於動盪之中，對嗎？

伊：對，而且團結工聯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我之所以會接觸到政治反對運動是因為我的一位歷史老師，她教波蘭和東歐史，和官方的歷史很不一樣，讓我很感興趣。我們學生常被邀去她家作客，也結識了一些異議分子和反對人士。所以一踏進這個圈子，就會陷入了。

所以在1980年大罷工開始時，我的角色是跟來波蘭的外國記者聯絡。1981年12月13日，波蘭政府戒嚴，然後我就有麻煩了。警察開始到我家搜索，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和外國電視和記者有很密切接觸的緣故。所以我12月的加拿大之行只好先擱著了。不過，一段時間過後，波蘭政府好像假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有點操弄政治的感覺。總之在那之後波蘭邊界又開始開放了。

在戒嚴時期所有人都要繳出護照。在1982年3月，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我的護照在那，要不要拿回去。我有了加拿大的簽證，萬事具備了，但我不想走。我和反對圈子的人談了很久，他們都說我一定得去，因為到了國外，我可以發揮的影響力比留在波蘭還大。我最終是走了，不過並沒有多開心，因為我在波蘭出生長大，那是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我到了加拿大之後，所有的人都認為我要申請政治庇護，可是，那其實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我搭飛機來、有護照、人也到了，就是這樣，沒別的。於是我就開始在ISA秘書處工作。我得說，那裡的人真的很好、很友善。後來我和Jacques Dofny 與Alain Touraine成為好朋友。Touraine後來是副會長。不過其實我在團

>>

結工聯的時候就認識Touraine了。

布：在妳去加拿大之前，Ulf Himmelstrand到波蘭訪問，而妳和ISA還有短暫的接觸過？

伊：他代表ISA去波蘭考察情勢。那時是1982年的冬天，Warsaw街上還是到處都看得到坦克，軍隊控制了整個波蘭。我和Ulf在機場碰面，然後在街上看看，和許多社會學家碰面。我那時候覺得Ulf的報告太政治正確了，政府看了會很高興的那種。不過後來我才知道他必須要很謹慎小心寫這份報告，不能洩漏資訊來源，要保護那些波蘭社會學家。

布：那個時候的ISA執委是怎麼處理冷戰議題的？

伊：那時候都很小心不要得罪任何一方。他們都知道執委一定要有蘇聯的人，不然就會有麻煩。所以那時候的執委選舉充滿了濃濃的政治考量。

布：所以後來妳去了Montreal去準備1982年的世界大會，然後就從此加入ISA了？

伊：是的。在墨西哥，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被選為會長，然後秘書處決定遷往Amsterdam。所以我就去了，跟著一位新的執行秘書同時也是社會學家的Felix Geyer工作。在那邊總共待了4年，而那4年也是由大學所資助的，我們在Amsterdam大學有一間辦公室。

布：那時妳關注的是除了ISA的其他事情嗎？

伊：嗯，我要適應新環境，而且我的確開始和波蘭的反對運動人士見面，在加拿大的時候就開始了，到了Amsterdam就更容易。然後我開始寫這些事情。這些經驗並不容易，但是都很有趣，是一個我們這個世代的革命。我很幸運可以親身經歷這場歷史事件，見證了一個國家經過了30年之後終於轉形成為一個自由國家。

布：對，團結工聯是一切結束的開始。妳沒有尋求政治庇護，為什麼呢？

伊：我沒有尋求政治庇護的原因是我怕我的家人遭受牽連。不過我也很試著去想怎麼才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波蘭所不為人之的真實面貌。我想要很堅定我的反抗意志，我所做所說的都是對的，不過那時共產政體還未徹底瓦解。總之很顯然的那個政府是不太對勁的一件事。不過我算是生活還算體面的人，來自中產家庭，父母都有工作，收入也不錯。我發現到我其實算是出身好的小孩。教育和知識那時候在波蘭是很崇高的東西，我們雖然都困在裡面，不過我們也都知道這個事實，也很熱切的去學課本以外的東西。正如我之前說的，我很幸運遇到一位老師，讓我們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然後那時候我們必須要熬夜把一本書看完，因為隔天就要把書再給別人了。以上種種都是很常見的波蘭經驗。

布：這些比較像是妳解釋給人們、讓他們瞭解波蘭的故事。那我很好奇妳本身怎麼看待團結工聯呢？

伊：我覺得很興奮！但後來變得有些批判。不過總之那是個停不下來的力量。在戒嚴之後，工聯就轉入地下運作。那是個非常特別的年代，你會看到在街上人們排隊領牛奶，大家為了生存而集結，為了爭取些什麼，為了改變情況等等。那時有一種特殊的團結感驅使著我們行動。

布：沒錯！還有教會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伊：教會就像個保護傘，保護著反對運動。特別是當有些父母親被抓走時，他們的小孩需要有人照顧。那時候商店關門，車子停駛，所有的事物都停擺了，是很艱難的一段時間。

布：妳將這些議題寫進了妳的論文，後來並以西班牙文出版了一本書，叫做Civil Society in Poland and Solidarity，對嗎？

伊：是，我的博論的確是寫波蘭的公民社會和團結工聯。當然我不是在講我的生命經驗。而我也不是把工聯當作是社會運動，因為這已經很多人寫了。我把他們視為是一種生命的再組織，以及人們的常生活等。我寫了一章關於反對運動的分析，然

>>

後寫關於人們怎麼組織日常生活，像是以物易物等等的。我在University Complutense (Madrid)的指導教授Victor Pérez-Díaz建議我把反對者的生命史寫進去，這樣一來好讓那些非波蘭的讀者可以更進入脈絡。

布：在共黨統治下的波蘭反對黨是怎麼樣子的呢？

伊：反對運動都不批判共產主義，他們想要改善政體、改善系統，希望共產主義更人性一點。

布：那是在1950，在一開始的時候。妳覺得團結工聯代表的是同樣的事情嗎？

伊：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是。如果我們看團結工聯的訴求會發現在最一開始時他們還包括了自由貿易聯盟，但最政治的部分就僅止於此了。其他都是像要怎麼讓共產主義個適合人，工作環境更好等等的，沒有人質疑那個共黨體制，要求的都是怎麼讓生活變好。

布：妳到Madrid之前，1982-86年時妳在Amsterdam，那時妳是許多異議分子的聯絡人，幫他們保管地下書籍，並且從妳這邊得到更新的資訊？

伊：對，我家永遠有多餘的一張床給房客留宿用。我家人和反對份子也都有聯絡，然後他們來這裡都會在我這邊住。這也是我會認識Ryszard Kapu ci ski的原因。

布：妳有和著名的Ryszard Kapu ci ski碰過面？他一定是個很傳奇的人物吧？他寫過關於伊朗、依索比亞、蘇聯的書都很棒！

伊：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其實很好玩。他到Amsterdam去推銷他的一本書，他也幫我從我家人那裡帶來了一些東西，主要是禁書。我當時住在荷蘭典型的閣樓裡，很狹小也很多樓梯，結果他就扛了那些東西，一階一階地爬了上來。當他一到的時候，就說：「不行了，我得躺下。」因為他有背痛的毛病，他扛了那些書讓他背更痛。所以這個有名的作家就這樣躺在我住處的地板上5個小時，動彈不得。所以也這樣我們後來成了朋友。

布：所以他除了跑國外的新聞以外從未離開波蘭，？

伊：對，他一直都在波蘭。總之我們談了很久，我對人生充滿了困惑，然後他告訴我：「你要知道，這世界上有98%的人都很快樂，因為他們很安靜，生活無憂無慮。但有另外2%的人像妳一樣，會問很多很多問題。」接下來他聽頓了一會兒，接著說：「那2%的人有義務一直繼續問問題。」

(待續)

> 兒童教育：
芝麻街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辯證

Tamara Kay, 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

南非小朋友正在跟Kami玩。Kami是一個毛茸茸的5歲HIV陽性的小女生。©2007 SesameWorkshop。Ryan Heffernan攝影。在這可以看到各個國家芝麻街的影片：http://www.sesameworkshop.org/

在印度城市裡的貧民窟中，小孩們圍在一台老舊的推車上，看著DVD的電視節目，裡面的角色正在用Hindi唱「ma」這個聲音。在坦尚尼亞，一群小朋友正在收聽如何掛蚊帳防制瘧疾。在南非，有10分之1的小孩其父母因HIV/AIDS而死亡，而電視節目告訴他們如何將這種疾病去污名化，如何面對失去與死亡。以上這些場景，有兩個地方是相同的：這些孩童在上學之後其實是屬於程度比較不好的一群，而現在他們正在利用芝麻街節目來減少他們的不利處境。

芝麻街的普及和成功是一個全球化時代文化政治化的絕佳例證。這裡展現了兩個彼此交織纏繞的謎題：美國的文化產

>>

品如何透過跨國組織傳播出去？這樣的產品如何在地方上獲得正當性，並廣為被接受？

The educational nonprofit Sesame Workshop (SW，前身為The 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的案例可以解答上述的問題，因為SW在世界各地成功地開創了接受度高、共同合作的芝麻街節目，教育學齡前兒童。此外，SW也和不論是政府、公民組織、NGO等在地的組織合作，並以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為優先，處理從識字到健康等議題(包括坦尚尼亞的瘧疾防制，南非的HIV/AIDS防制等)，還有社會平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南非、北愛爾蘭等地的宗教和族群包容議題)，等等。這些計畫以移動式的牙醫診所、模範學校、公共宣傳、免費物品的分配(書、教育遊戲、DVD、家長手冊等)，強化地方家長的教育目標，特別是那些沒有辦法看到電視的地區的孩童。

訪談和民族誌中我們發現在拉丁美洲，儘管有些內容或許會有爭議(性別、種族等)，對於芝麻街節目的接受度相當高，很大的原因在於SW願意和當地的合作伙伴討論。SW是跨國組織中非常特殊的例子，因為他們採取的方式是在各地組織在地的工作團隊。雖然還是有所限制，不過在地團隊已經有很充裕的自由去製作節目。所以SW的案例可以我們看到了以往總是不為人知的協商過程，而這個協商政治正式讓文化整合得以可能的關鍵所在。

在科索沃，協商讓SW重新去檢視何謂核心價值：用字母系統去教育文盲。阿爾巴尼亞和塞爾維亞人對字母系統並無共識(無論拉丁或是斯拉夫語)。除了語言問題之外，他們也不願讓節目中出現兩個不同族群的小孩在一起的畫面，因為家長不會讓他們的小孩收看這種節目。這種種限制原本差不多要讓合作計畫夭折了，不過最終他們還是想出了別具創意的解於辦法：用「視覺字典」，就是讓小朋友手上拿著物品，例如太陽眼鏡，然後用不同的語言說出那個物品。

文化接收對於巴勒斯坦來說是很重要的。1994他們拒絕被併入以色列，並要求相互承認尊重。他們擔憂芝麻街會危害他們國內新的但是脆弱的電視節目，而且和以色列與美國人合作肯定會遭受抨擊。不過團隊核心認為這是一個訓練巴勒斯坦年輕人和建設基礎建設的好時機，所以要求大量的資金要放在人員訓練上面。總之，巴勒斯坦的文化接收取決於他們如何和美國去協商，去表達什麼他們認為是重要的事情。

共同產品內容的協商是很重要的，這樣一來才得以滿足SW在孟加拉和南非的在地需求。孟加拉在開始的時候其實很猶豫要不要在節目中加入芝麻街的布偶，因為他們的文化中有歷史悠久的木偶戲傳統。雖然SW沒有要求他們使用布偶 (如由Jim Henson Company所創造的木偶)，孟加拉的團對最後決定設計自己的布偶 (包括孟加拉虎和狼)，以及在Sisimpur加入傳統的孟加拉木偶。SW和在地團隊一起討論出了一份計畫，並得以整合在地文化，透過Ikri這個布偶，這個進入Ikri世界裡面—孟加拉傳統木偶所居住的地方。南非則是在第二季的Takalani Sesame中加入處理HIV/AIDS議題的單元。儘管SW一開始有點遲疑，不過最後他們還是一起創造了一個HIV positive的角色：Kami。

證據顯示SW的麼行對於計畫的結果有正面的影響。共同生產的成功與計畫的普及讓人嘖嘖稱奇。在孟加拉，使用Sisimpur的小孩被發現比其他不用的孩子們高出了67%的識字率。在埃及，收看Alam Simsim的四歲孩童的數學表現和五年級的學生一樣。研究也發現在地的高接受度也增加了SW的正當性與普及性。SW不僅研究共同產品的教育效果，也研究產品是否被認為是在地的(事實上正是)。在埃及，18個月內Alam Simsim的普及度就有98%，現在就跟美國生產的一樣了。印度有5200間公辦的托育中心將Galli Galli Sim Sim納入其課程之中。Sesame Street或許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兒童教育節目了。

有一個研究傳散的理論指出了一個新的框架去理解那些限制和導致接收者反抗文化全球化的因素。這個理論也說明，若是一個文化產品可以成功地被世界各地所接受，那其實是有賴於跨國組織之間更平等的關係。雖然傳播反映了西方價值、習慣、產品的霸權，在SW的案例中我們則看到了接收者的力量、影響、自主。在芝麻街上，我們的確看到了文化的協商是如何可能的。

> 科學的立場：Rio+20永續發展聯合國會議

by Herbert Doc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1

2012年6月20日Rio+20會議中人民高峰會遊行的雕像之一。Herbert Docena攝影。

聯合國的會議每年都越辦越大，吸引了許多政府官員、社運人士、企業經裡、名人等爭相參與。今年6月在Rio de Janeiro舉辦的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據說是歷史上最大的聯合國會議，科學家可是擠破頭的想參加。

大企業的總裁CEO是在高級酒店裡面開會討論生意，社運人士則是在公園裡面召開人民高峰會；而科學家則和官方的會議同步，在Ipanema 附近的Catholic大學召開了「科學、科技、創新論壇」。不像其他企業或社運的會議，這場科學家的集會目的並不太明顯。不過無論如何，這其實展現了科學在這次的環境危機中所採取的姿態與立場。

> 這是什麼樣的學術會議？

>>

雖然我們可以看見有各種尖端技術的報告，不過這可不是一般典型的學術會議。因為實際上也沒有那麼多的科學家來一一的討論報告中的議題。多數的參與者是官方代表或是特定組織的人員，像是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或是伙伴組織如UNESCO，以及科學NGO，例如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我是本屆代表)。還有其他零散的參與者來自各個科學的領域，或是營利企業，像是Dow Chemical的副總裁或是Blackberry的CEO。

若要說目標是去強化不同學科之間的連結，那麼其實也沒有那麼多時間與機會讓參加成員去彼此交流。因為在5天的議程裡面，觀眾要坐在台下一直聽台上演講，一場接著一場，7到8為講著輪番上陣，一講就是2個小時，Q&A的時間通常只有最後的15分鐘而已。

不過還是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例如，有一位地理學家說他還好不是個環境經濟學者，所以不用去想要很偉大地去測量生命的成本或是森林的價值。這樣的宣稱其實碰觸到了社會科學內存在已久的爭論，也表達出了地理學和經濟學之間長期的對立情結。另外一個例子是當一位工程師偶然間說到社會科學的角色就是去評估工程師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有沒有文化上的妥當性。這個說法也觸及了長久下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分工辯論。再者，講者們其實都認為物理學家、化學加、工程師是自然科學家，而社會科學家卻都被晾在一旁，好像他們連是「自然的」還是「不自然的」都無關緊要。涂爾幹所說的「社會是所有自然界中物理和道德最為有力的集合體」，似乎才可以稍微擄獲社會學以外學科的目光。

學科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反映了學科之間世界觀的差別，也提示了我們它們之間隱微的權力關係議題。這個議題可以透過深入的對話而進一步討論，這次的跨學科會議就是很好的例證。

> 尋覓政府和企業的合作伙伴

就像主辦者所說的一樣，這場會議的目的並不是要幫助科學家化解歧見。的確，你會發現參與的聽眾多數不是科學家。

一週的會議下來，講者的對象其實很明顯的有2群人，而部分的人就在台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企業人士。講者大多都批評科學家和投資者之間的巨大鴻溝：也就是後者對於前者並不感興趣，也不怎麼想要支持。所以演講者都希望可以填補這個縫隙，建立科學家和決策者之間的合作關係。

講者也為了找來更多的資金贊助者、企業人士、決策者等一起去共同規劃與生產，好幫助業界或實務界去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因此，後者可以拿到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公民社會的其他部門」也在會議中被強調，不過非科學家的人中，沒什麼人有興趣想聽。科學家希望藉由提供政府和企業相關的知識，像是「GEC」(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等，讓他們開始去想像未來。總之科學家現在努力的想要打造一個概念：「綠經濟」。

可以確定的是會場內還是存在批評的聲音。舉例而言，ISSC的代表常挑戰來自自然科學之科技官僚式的言論，並指出當今環境問題的歷史與系統性成因。也有與會者認為要和社會運動更廣泛的結盟，例如和在厄瓜多要求「別挖石油」的社運團體。

然而多數時候會議所展現的不過是科學—政府—企業三方的對話，這是很傳統的科技官僚的預設和管理學的想像，也就說：通常決策者不具有知識，需要科學家來提供，然後有了知識做為參考依據的決策就可以掛保證了。無知就是環境問題的根源，解決的辦法只在於由上而下的管理，而非由下而上的反抗。

其中的一個方案就是去體現上述這項預設。這個ICSU的「地球的未來」的計畫相當有野心，規劃了10年的研究，企圖納入上千名科學家去傳播得以讓地球永續發展的知識。而這項計畫也已經得到了好幾位有錢的研究贊助者的背書，是「史上最特別的伙伴關係」。Blackberry的CEO也很贊同這項計畫，鼓勵可行的研究方案，並且提醒在場的聽眾要避免「空想」的危險。

儘管有些批判的聲音，不過場內呼籲政府與企業要與之並肩作戰的訴求，讓這整個會議很難不和遊說聯想在一起。這場會議由科學家所規劃，目的是要政府和企業多支持科學家的計畫，去投入資源一起適應和管理我們目前面對的環境危機。

> 待解的問題

科學家試圖找尋和企業與政府合作雙贏的機會並不代表這些科學家就是見錢眼開的研究者。他們有可能真的是有意無意的和他們所設想的那些合作伙伴有著一樣的看法。下列這些正是其中幾個本來應該在會場中被提出討論但是卻沒有的問題：

- 我們是否應該將自然想像成是「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而我們又該將這些服務營利化嗎？

在Rio的官方峰會中，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和許多社運人士甚至很反對使用「生態系統服務」的字言，因為這個字被美國等其他已開發國家長期以來推動使用，最終的擔憂是怕自然

>>

人民高峰會在Plaza Floriano的抗議遊行。此處是Rio de Janeiro的downtown，距離主會議40公里。Herbert Docena攝影

會有一天被「金融化」。不過科學家還是一直在用這個詞，用得很高興。當被質疑時，其中一個地理學家(一位「地球的未來」計畫的倡議者)這樣回答：「去讀一下上一期的「自然」期刊。基本上你的問題根本已經不成問題了，好嗎？」

• 真有可能去調節開發和環境保護或永續發展嗎？綠色經濟真的可行？

在Rio的人民峰會中，無止盡的成長被認為和永續是毫不相容的。綠色經濟責備嘲笑為是綠色資本主義，保存自然是以備將來真的需要大規模的結構變遷時可以有充足的資本。不過科學家在做的是去向政府或企業推銷他們的經驗，讓不可能成為可能。

• 究竟誰該為環境危機負起最大的責任？我們和這個該負起責任者的關係又是什麼？

這次許多的跨國大企業和有錢的政府—所謂的權力菁英—是大家的眾矢之的。人民峰會中把他們稱為罪犯和兇手。不過在科學家的眼裡，他們確是合作伙伴、設計伙伴、製造伙伴。「我們不應該把權力菁英視為敵人」，一位人類學家這麼說。「那樣講很沒建設性，我不認為我們有改變政治的能耐，能做的唯有和政府結盟，別無他法。」

> 中立的權力

企業家持續地去尋找政府和企業的伙伴，推銷一個最大的賣點，而且這個賣點是在Rio的所有人都沒有的：他們的「中立性」，事不關己，興趣缺缺。他們在提倡「科學和社會的新伙伴關係」時，總是下意識地炫耀這個中立性，彷彿自己置身事外，從來就不屬於這個社會一樣；或是當他們鼓勵和決策者或是股東有更緊密的關係時，總是表現出好像我們沒有能力作決策，或是我們看待問題的方式一點也不重要。或是他們堅持任何科學研究成果都應該是政策導向而非政策診斷時，表現出好像他們堅持的綠色經濟就不是在為政策提出診斷一樣。

然而，儘管這些科學家總是宣稱自己很中立，不過事實上他們早已選邊站了。 ■

註1：Herbert Docena感謝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的獎學金支持他到聯合國參加Rio+20會議。

> 競合：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by Sylvia Walby,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前ISA經濟與社會委員會(RC02)會長

家庭和小孩在Camden的RBS/Nat-West bank參加Uncut的「Big Society Bail-Ins」抗議活動，反對女性歧視。倫敦，2011年2月26日。

人們對於金融危機的影響與意義仍存在著歧見。2007到2012年所發生的這場風暴是個經濟再結構化的契機，可是，是要向左走(社會民主或社會主義)、或是向右走(新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呢？本篇文章認為：性別是這個結構化過程的核心議題，因為所有新自由主意和政府的方案都是性別化的。

> 新自由主義的源頭

金融資本的擴張是個全球化過程，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是有所差別。因此我們想要檢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公民社會、國家、以及其他政治實體等因素會導致什麼樣不同的結果。

在歐洲，危機帶來的是政府支出的削減。不同國家之間或有差別，但差別不大。政府赤字和債臺高築讓人們覺得國家都快垮了。對此，我們目前有許多不同的解釋。

第一，有些人認為金融危機是導因於福利支出過多。這種解釋只針對財政赤字，將問題歸因於稅收短少、經濟蕭條、失業率攀升等表面病因。

第二，其他有論點指出因為歐元作為共同貨幣，使得個別的國家無法調節自己的貨幣政策。但是所有的解決方式都是貨幣貶值。這是在1930年代就被證明是很糟的對策了(敵視歐元的英國也採用了)。

第三，另有人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後果，因為現在的資本積累已經窮途末路了。未

>>

來不是邁向野蠻的弱肉強食，就是蛻變為社會主義(Harvey)，再不然就是轉形成另一個霸權(Arrighi)。可惜的是這種論點過於決定性，忽略了政治與社會的脈絡。

第四，還有最後一種主張—同時也是這篇文章想要進一步闡述的—分析道：金融危機並非資本主義的下一階段，而是一種牽扯金融資本與政治力量相互纏繞而成的計畫。在此論點之下，論者辯論到底何謂這些力量的本質與影響。當執政者無能為力處理問題，舊的政黨就竭盡所能地想出手解決。新的計畫，包括了Occupy運動和Uncut等，是一股在國家之外發展起來的政治力量；新的政黨和聯盟則努力想奪回政權。而此外我們會看到這個主張的特點在於：這些勢力和計畫都是性別化的。

> 撙節是女性主義的議題

在過去幾十年裡面我們看到在福利國家中，個無論是教育、健康、照顧、或是就業管制的領域，都存在著性別化的面向。這通常是由女性主義和勞工主義的社會與民主計畫的結果。這些政府政策與社會實踐也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和去管制化。性別和階級逐漸分道揚鑣，因為女性慢慢地在政治上取得影響力，但是工會力量卻逐漸式微了。而新自由主義在金融危機發生期間對於既有的社會民主制度發動了性別化的攻擊。

稅務也是女性主義的議題。國家編列預算的過程也是性別化的，而且分配給女性相關領域的預算特別少。在英國，House of Commons Library的報告中指出在2010的年度預算中，個人增稅的總額是£81億英鎊，其中58億 (72%)是屬於女性的，只有22億(28%)是男性。然而稅收沒有增加多少的情況下(男性稅繳得少)，公共設施的支出則大幅降低(使用者幾乎是女性)。在這種幾乎是免稅天堂和引進金融交易稅的情形下，政策都是性別化的。

英國的另一個例子是國家預算的減少以提供地方的社會福利，像是收容所等，並且提供工人支持和建議，然後防制針對女性的暴力。真是一種性別化的社會民主政策，因為提供的是對女性受害者的保護，而非對罪犯的嚴懲。一個例子是在預算不足的情況下，NGO和工會一起耕耘資訊自由的這塊社運戰場。國家預算少1%，對於地方來說卻是少了31%去防制婦女暴力案件，因為這些相關政策往往沒有受到法律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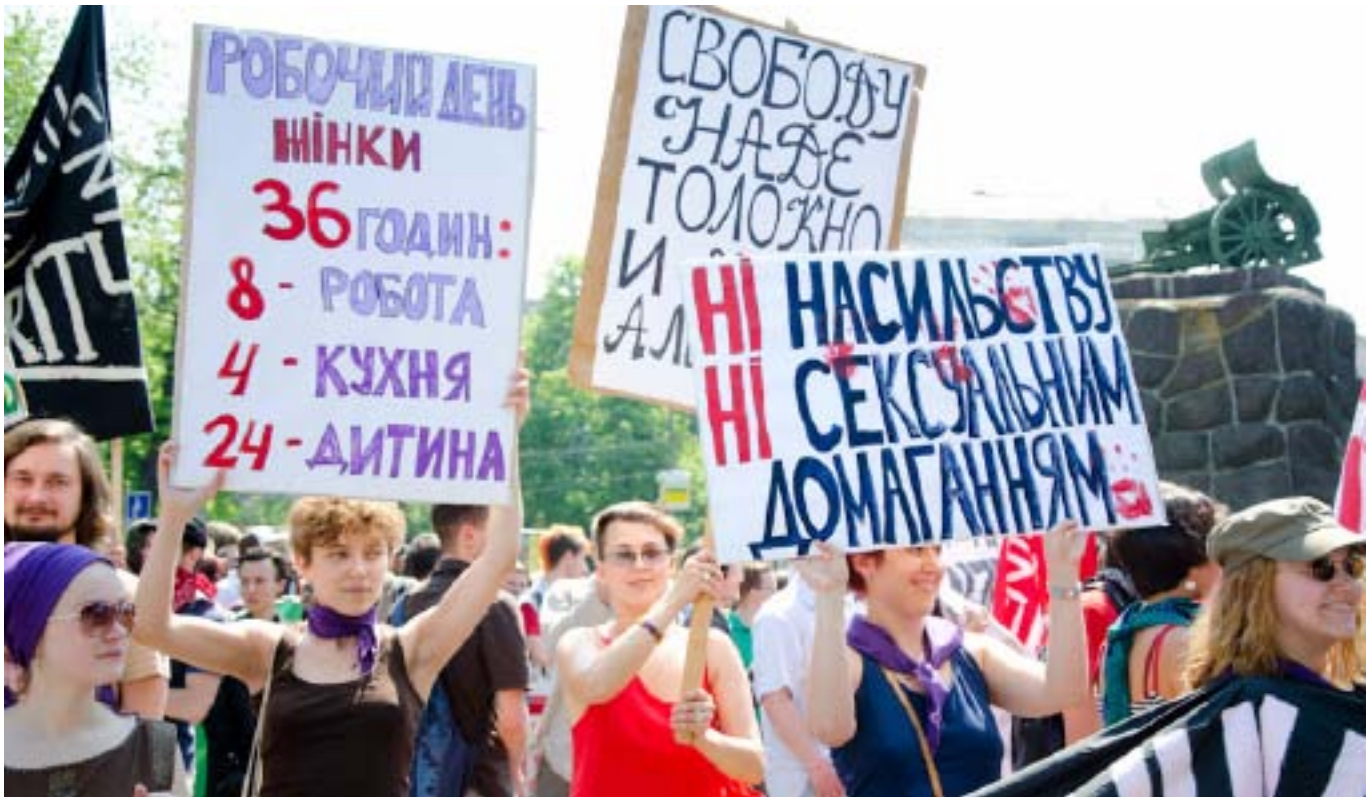
> 分歧的回應

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經濟與社會的再結構化導致了許多重要但不同的後果。我們可以從對比公民社會的社運和挑戰國家機器的社運這個軸線來看待這個現象。公民社運，像是Occupy，在歐洲和北美可說是遍地烽火；不過還有其他是針對國家政策(稅收)的運動存在，例如Uncut。新的政黨勢力在政府失靈的脈絡下已經蔚為一股氣候了，不論在法國(Left Party)、德國(Die Linke)、冰島都是如此。這些左派政黨帶有著強韌的女性主義思想；這麼一來，有些人想把左翼與女權運動分離、對立起來，這似乎不太對吧。我們也可以看到左派和女性主義的新結盟。例如在冰島，社運就比較著重在民主化，而非經濟危機的議題上面。

經濟危機的警報還未解除。想改變結構的任何企圖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運動只是其中一個因素。這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議題，也關乎性別。結果仍有待討論！ ■

> 烏克蘭的女性主義運動

by Tamara Martsenyuk,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烏克蘭



國際女權日(3月8日)讓烏克蘭女性不僅獲得了許多鮮花的慶祝，也提醒了大家女性今日的權利可是經過了一個世紀的爭取才換來的結果。去年一位女權運動者提出了「Feminist Offensive」的構想，以新的方式去慶祝女權日，包括女權工作坊、國際研討會、以及女權大遊行。

「Feminist Offensive」(http://ofenzyva.wordpress.com)是一個公共性的倡議運動，旨在與各種形式的父權對抗(性別歧視，恐同、恐跨性別、年齡歧視

Ofenzyva (“Feminist Offensive”)的運動者在2012/5/1時於Kyiv抗議，標語是「Working dayof woman: 36 hours: 8 – wage labor,4 - kitchen, 24 – childcare」;「No to violence, no to sexual harassment」、「Free Nadya Tolokno」(一位和俄羅斯人Pussy Riot一起被逮捕的社運人士。Ofenzyva攝影。

>>

、種族主義、沙文主義)，並捍衛女性的經濟和生育權利。此外也試圖去改變社會和法律上的性別歧視，並開創更多的性別批判研究、獨立的社會運動、女性主義的解放知識，以及性別平等的語言。

為期3天的「女性主義：集體觀點」國際研討會 (3月5-7日, 2012)，象徵著女人的集體認同。由Feminist Offensive所舉辦，學者和社運人士齊聚一堂。與會者來自各國，包括烏克蘭、俄羅斯、波蘭、塞爾維亞、芬蘭、法國、美國。在「女性主義政治參與」場次中，參與者與大家分享草根如何對抗女權被侵害的運動經驗。女權團體「La Barbe」(英文的beard，山羊鬚)藉著戴上山羊鬚，進入會議場地干擾，去強調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長期缺席。「ACT Women」(塞爾維亞)則在街上以行動表演表達他們對於性別歧視暴力的批判(國家暴力、屠殺女性、強暴等)。俄羅斯搖滾團體「Pussy Riot」因為在莫斯科教堂中表演被俄羅斯政府逮捕了而無法參加這場會議。會議也邀請到了烏克蘭著名的女權團體「FEMEN」(上半身裸體抗議)來分享經驗。可惜的是「FEMEN」後來要到土耳其去參加一場抗議，她們覺得那比較重要。

會議期間我們也討論了在烏克蘭、波蘭、俄羅斯等國宗教和極右派對女性的攻擊案例。波蘭的人類學家Agata Che stowska檢視了墮胎的辯論，以及在政黨政治中如何被操弄；其認為這是波蘭為了要和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盟)談判的籌碼，而非真正關心女人的生育和健康。Lesya Pagulich和Galina Yarmanova分析了基本教義派的論述，因為最近對於女性的墮胎、人工生殖、同性戀等議題，基本教義派的批評可說相當活躍，不容小覷。

至於國家和教會聯手打壓女權的現象也是討論重點，並且是2012年3月8日女性主義大遊行的主題。參加者總計超過200人，標語是「是該政教分離的時候了！」(而最近烏克蘭才通過一項法案要對30歲以上沒有小孩的人課稅！)去年的口號是「少點家務勞動，多一點知識！」，「父母親的社會支持」，「家庭：讓人愛的地方」等等。烏克蘭女性主義者也要求釋放「Pussy Riot」的成員。

遊行之後，在3月12日於Verkhovna Rada (烏克蘭國會)，當副議長Andriy Shkil提案禁止墮胎時，反而發生了攻擊女性的事件。現在的法律允許懷孕小於12週的女性墮胎。2012年秋天的選舉一定會大肆炒作這個議題。

在宗教和政治聯手攻擊女性的生育權之後，女性的NGO聯名寫了一封信給烏克蘭總統，要求墮胎除罪化。2012年3月27日，女權運動人士舉辦了記者會：「屠殺女性：多胎罪刑化的危險」，要求停止這個歧視的法案，停止侵害女性生育權利和健康。

總之，在近2年裡我們發現烏克蘭的女權運動相當活躍。相信很快地在不久的將來，女權運動一定會戰勝父權壓迫！ ■

> 日益危險的拉丁美洲

by Gabriel Kessl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阿根廷的抗議人士要求「Stop Insecurity」。2009年攝於Buenos Aires

拉丁美洲的犯罪問題日益嚴重。這裡的人口不過佔世界的14%，可是因武器而致死的人口卻佔40%。在智利、阿根廷、哥斯大黎加、烏拉圭等國雖然犯罪率是較低的，不過人民仍然處於生命危險的恐懼之中。我用多元的研究法去探討阿根廷人們對於「不安全」的感受，並且和其他國家做比較。1大眾對於犯罪的恐懼日益蔓延，這也影響了他們對於社會的想像和作為。大家都認同這是個公共議題，並瞭解到和過去的犯罪現象並不同，我們而且必須仔細考慮相關的因素、人們遭受的風險、以及解決之道。部分答案其實可以在研究不安全的社會學知識中找到。研究結果顯示出：不安全感和以往很不一樣。一方面這和之前對於威權統治的恐懼並不相同；二方面，那些其實相對安全的群體卻對抱有著很深的不安，這是個新的現象。

>>

第一個相關的研究出現在美國1960年代。此後，對犯罪恐懼的研究就和犯罪學本身獨立開來了。犯罪恐懼感在犯罪死亡人數增加時會提高，但是即使治安好的時候，恐懼感也沒有因此下降。犯罪恐懼感是指人們在面對犯罪行為式的情緒反應。然而，我們比較喜歡用「不安全感」這個字，因為雖然恐懼還是我們主要的關心對象，不過，「不安全」包含了更多的意義，例如生氣、憤怒、無能，而且這有政治的意義，讓我們找出原因以及相關的行動表現。

那什麼是阿根廷人民的不安全感呢？不安全和違法並非總是相關的。不安全感其實是一種威脅：一種對於生命和財產的威脅，而且有可能危害到任何人。其中的一個重要面向是它會影響人們心中區別安全和不安全的那一條界線。另外一個面向是不安全感對象的不確定性。所以威脅不再是來自於侷限於刻板印象的群體(如無所事事的青少年)，而是任何一個人。這也讓隨機的不安全感更加強化。

相關研究也指出了許多尚待解答的問題和謎題，例如：為什麼在風險相對低的群體(媽媽或小孩)裡，卻覺得自己極度不安全呢？恐懼和階級有關嗎？我試著從阿根廷的研究中去回答這些問題。量化分析顯示，上述差異沒有特別顯著，不過質化結果卻指出了差異的軸線索在。普羅階級覺得物理與社會的威脅感很大，不過中上階級卻相反。親近性影響了由下而上的政治解讀。在普羅住宅區中，對於犯罪個案都有爭議和討論，而且由社區本身提出解決辦法。在中上階級裡，由於距離犯罪比較遠，所以對犯罪的觀點都是由上而下，沒有個人的因素在裡面。然而，親近並未帶來同情，疏遠也未帶來苛責。親近性反而會產生道德上的指控，因為即使處於相同的社會階級，家長都會強調「我的孩子並不會偷東西」。反而，中上階級的人會說「其實這些小孩子並不壞」。疏遠通常會用結構因素去解釋犯罪行為，或是政治性地解讀為犯罪是現代版的游擊戰。所以，責罵的程度和階級的高低並無區別。

性別則是這整個謎題的核心。研究指出女性通常有較深的恐懼。而相關的討論也都強調這個性別差異。可是，當不安全感擴張到其他社會群體時，也會越合理化於恐懼的表達和感受也。若我們結合量化和質化的分析，會發現在量化中比較不怕表達恐懼的群體，在訪問中也對這種恐懼感的表達感到非常正常。

當在少數群體中測量恐懼時，這通常和對於威權主義的態度相關。在當代，有一項爭論是不安全感的增加是否也提高了贊成嚴格懲罰罪犯的態度。通常說來，恐懼會隨著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而不同。而不安全感也會減少對民主的信任。另外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趨勢：亂世用重典。這意味著大家會越來越贊同嚴懲罪犯，即使對於輕罪也是如此。而我們對於社會危機的解釋也越來越沒效，因為以前的共識是犯罪是新自由主義的後果，而今雖然經濟或平等有所改善，犯罪卻沒減少。因此，對於拉丁美洲而言，挑戰在於如何去為亂世用重典的現象找到更精緻的解釋。而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現象已經從將犯罪行為歸因給社會結構轉變為指控個體行為了。

上述這些只是關於不安全感的一部分問題而已。若要能解答這些問題，或是讓這些問題可以被社會所廣為認識，那還有賴於我們民主政治的品質了。

註1：Kessler, G. (2009) El sentimiento de inseguridad – Sociología del temor al delito [The Feeling of Insecurity: Sociology of the Fear of Crim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 哥倫比亞的黑人中產階級：矛盾修飾法？

by Mara Viveros Vigoy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Bogotá, 哥倫比亞

根據研究指出，哥倫比亞的黑人是收入最低、生活水準最差、童工比例最高、最沒有社會安全保障的一群人(Urrea et al., 2004)。再者，這些事實也證明了哥倫比亞種族主義的橫行：只有很少的黑人男性和極少的黑人女性在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裡面工作，而且媒體上黑人的形象總是很差的。在這個脈絡下，我們若是想要研究上述這些現象以外的黑人，有意義嗎？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可以去再現非裔哥倫比亞人的歷史進程，因為這樣的歷史通常被排除在官方歷史論述之外。所以相較於對黑人充滿刻板印象的官方歷史，我們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歷史圖像。

此外，我們也從研究中發現了許多以往被忽略的因素，像是性別、種族、階級等，而這些因素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哥倫比亞的黑人中產階級的形塑過程。以下我將介紹回顧這樣的研究結果(Viveros and Gil, 2010)。

> 誰向上流動了？

在20世紀的時候，農業和礦業帶來的資本的大量積累，加上教育機會的增加，在許多地方出現了黑人中產階級。黑人中產階級雖然還是會遭到種族歧視，不過他們相對地可以在經濟或政治上取得影響力。我以下要介紹的案例是來自於Bogotá的黑人，他們多數來自於太平洋區，也是最多哥倫比亞的來源地。

若分析三代的黑人社會流動軌跡，我們會發現有兩個主要群體：繼承父代或祖父帶的社會階級，以及階級向上流動。我們還可以發現社會流動的差異點：有些人是逐漸的流動，有些則是快速流動。女性相較於男性，向上流動的機會比較少。向上流動的黑人女性通常是專業階級的後代，或至少上一輩有一定水準的教育程度。反之男性並非如此：向上流動的男性有可能其父親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若我們看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上一代教育情況，會發現教育取得的改變通常發生在第一代和第二代。

> 黑人向上流動的性別議題

社會流動除了代表的收入的增加之外，也代表了階級慣習(class habitus)的繼承。雖然這通常指涉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不過這之中也有性別和種族的差異。中產階級除了本質上就是為了和普羅階級進行區隔之外，他們性別組成也是基本的一環。在這個意義下，社會流動也包含了上層階級性別規範的內化，也就是要成為可以被上流社會所接受的男人和女人。更精確一點，就是黑人女性要像白人或是混血的女性看齊。這種自我教化的過程影響了那些從屬階級的人，不論在工作

>>

場合或是家裡，都要把他們轉變得有紀律、有想法、有活力。

在我們訪談過的女性之中，會發現白人女性的文化就是要成為模範母親或太太，說話、舉止都要有有條有理，中規中矩，完全要像個上流社會的女性一樣。為了達到這樣的境界，黑人女性要從很早開始，或至少在婚後，就要「去性別化」，否則很有可能會被認為粗俗淫蕩。

對男性來說則是要為自己的工作負責，負擔起經濟重責大任，舉止合宜，堅持自己的男子性，必且在公共場合像個紳士，如此才能完全擺脫眾人對於黑人男性的刻板印象：懶惰、粗俗、下流。

> 個體而非集體的向上流動

哥倫比亞的階級流動通常都是個人式的流動，這和美國的集體階級向上爬升不同(Frazier, 1975)。在哥國，黑人中產階級還沒辦法將這樣的階級流動形成一股集體力量，也沒辦法將影響力超出個人的家庭範圍以外。所以我們對於這種階層路徑的分析可知：成功黑人的例子同常是受惠於自己的家庭。而這樣的例子還不足已影響到整個黑人社群，也很難成為黑人族群的模範。同時這也顯示了黑人社群內部的差異。所以，當我們在考慮性別、階級、性的時候，很難排除掉種族的因素。

當我們想要解決社會邊緣話或是種族歧視等問題的時候，社會流動的研究就顯得相當重要。哥倫比亞的黑人中產階級其實是個特例，因為幾乎所有的社會因素都不利於黑人中產階級的形成。而這樣的案例也提醒了我們種族主義始終在那邊，從未消失。並且，由於這個案例的複雜性，也代表了當我們在關照黑人群體的社會問題時，黑人中產階級仍然是個不可不去考慮的重要因素。 ■

References

Frazier, F. (1975) Black Bourgeoisie: The Rise of a New Middle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Urrea, F., Ramirez, H. F., and Viáfara, C. (2004)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s of the Afro-Colombian Population in Regional Urban Contexts of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M. Pardo et al. (Eds.), Pan-Afro Social Studies in the Pacific. Bogotá: ICAN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213-269.

Viveros, M. and Gil Hernández, F. (2010) "Gender and Generation in Black People' s Experiences of Social Advancement in Bogotá." Maguaré 24: 99-130.

> 俄羅斯社會學的真實面貌：對Vakhshtayn論點的批判

by N.V. Romanovsky和Zh.T. Toshchenko, 俄羅斯社會學期刊Sociological Studies主編

俄羅斯社會學家Vladimir Yadov (左)和Nikita Pokrovsky (右)在莫斯科的社會學年會，2011/6/6。

我們想針對Victor Vakhshtayn在全球對話2.3的文章提出批評，並說明俄羅斯社會學的情況。首先，Vakhshtayn對於當代俄羅斯社會學的描述實際上受限於他過度狹隘的方法論觀點。由於他不從事經驗研究，所以他的論點都是綱要性的。正因為Vakhshtayn沒有類似經驗，所以他從未瞭解問題的所在。我們尊重他的文章，可是必須承認我們不贊同他的論點。以下我們將闡述自己對於俄羅斯社會學的看法。

作為社會學期刊Sociological Studies (Sotsiologicheskiye Issledovania; SOCIS。根據Vakhshtayn的調查，有66%的2008年俄羅斯社會學年會的參與者有閱讀這份期刊)的主編，我們長期接觸浸淫來自Moscow、St. Petersburg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社會學研究。在這裡，超過4000位的社會學家發表研究，的確，他們並非總是非常順利，當然會遇到挫折。

> 俄羅斯社會學

第一，我們可以找到很有創意的研究，涵蓋了這個國家的各種重要社會現象。學術界都熟悉V.A. Yadov的作品，其經驗研究想要發展出原創的方法去處理工人意識和行為的變遷。而N. E. Pokrovsky教授(同時也是ISA執委)則研究北俄羅斯的農業生活過程。V.K. Levashov則研究俄羅斯社會的發展，20年來都致力於永續發展的觀念。最後，本文作者之一Toshchenko 的作品Paradoxical Man則受到了P. Sztompka，Z. Bauman，和T.I. Zaslavskaya的推薦。

第二，研究主題包羅萬象，並且地理範圍也增加了。讓我們提供一些例子。在Rostov的社會學家U.G. Volkov處理了俄羅斯社會的創造性。從Nizhny Novgorod來的A.V. Shkurko也論證了神經社會學的可能性，以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結合。在型態學方法的基礎上(收入、教育、權力)和論述符號(名聲、重要性、地位)，在Irkutsk的O.A. Karmadonov研究社會階層化，並揭露了俄羅斯社會各種不同的轉變過程。

第三，研究活動越來越深入。對於著名概念的應用(如res publica)廣泛，像是應用到都市研究以及社會下層建築的議題上，這是由O. Kharkhordin 所領導的

>>

(European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第四，後共產社會學帶來了新的研究主題，例如V.V. Radaev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研究的市場化問題。他的研究在國內國外都很有名。

最後，在俄羅斯的每個大學內都會共同研究，和歐洲、美國、印度、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合作。這裡我想不需要特別的例子來解釋了，因為這具體的體現在我的學術發表的實踐中。

俄羅斯社會學的重要性可從兩份英文期刊中窺知一二：Sociological Research和Society and Education ，由M.E. Sharpe，文章由 Russian journals of sociology匯集而來。我們有有超過30種的社會學刊物，並且都由自主的大學所支持，提供一個讓學者可以分享、辯論知識的園地。

> 俄羅斯社會學所面臨的問題

要說沒有問題是不可能的，可是問題也鮮少是從成功的經驗中發現。俄羅斯有超過300間社會系所，110間設立有博士班，這是我們很驕傲的一點。但是這過去20年的急速發展也有缺點。我們訓練的品質還有待提升，因為有些老師是從其他學科畢業的，所以可能連他們自己都還是新手。

社會學的資料可說是社會資訊的一部份，並且在俄羅斯，媒體都會引用社會學的資料。不過這也讓大公司找到了操弄得空間，並且新聞業者會依據其利益審查新聞內容。在選舉時期有許多自稱是社會學家的人去投入選戰，而這些人是選舉陣營花錢請來的假貨。

和市場導向相比，社會學開始撤退到「社會學的社會學」 (Vakhshtay在這點上是對的)。沒錯，社會學是該檢視自己的學科預設，不過但是一旦當這變成了目的，那麼社會學就會和社會脫離，最終就是變成一種剩餘的學科，不再被社會需要。不過若要說這是俄羅斯社會學的主流現象，那麼也言過其實。有超過80%的俄羅斯社會學其實是從事經驗研究的，包括經濟、勞動、都市、農業、青少年、教育、偏差行為、政治等等議題。

Vakhshtayn對於他所言的新蘇維埃和反蘇維埃語言感到不悅。這種現象指的是有些學者屬於比較傳統，有些則背離了傳統。對我們來說，這個論點一點也不新奇。「傳統主義」認為必須要用新的方法研究現在的社會，而自由派社會學家則發現他們的期待並不切實際—因為俄羅斯之所以被這些自由派學者認為經濟分配是不正義的，是由於俄羅斯的轉型路徑並不同於西方。所以，十年前彼此針鋒相對的論點如今已經逐漸聚合。這樣的結果並不是因為他們想這麼做，而是奠基於紮實的經驗分析之上。儘管還是存在著差異，不過學術界都承認：經驗研究所累積的成果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

總之，讓我們為Vakhstayn的論點作個批判性的總結。Vakhshtayn把個人性的觀點當作是俄羅斯社會學中各種立場的縮影，所以他批評的對象是自己紮稻草人。諷刺的是，他這樣的論點正是他自己所反對的。 ■

> 撙節時代的英國社會學

by John D. Brewer, University of Aberdeen, 蘇格蘭, 英國社會學會會長, 2010-2012

英國社會學會(BSA)在2011年慶祝了60週年。BSA的2500名會員的規模，在世界上並不算大，不過卻相當有力。這是歷史上最多人的時候，而且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證明我們的生氣蓬勃。我們現在發行4本期刊，有歷史上最多的讀書討論會，以及每年舉辦2次會議。像是今年就舉辦了有50個活動。不過這一切都被英國的高教改革給抵銷掉了：取消對大學的公共補貼和減少資助學生。沒錯，BSA也關心撙節。

2012大會的主題就是撙節，在Leeds University舉辦，這是London之外最大的一場會議。我剛好也將卸任3年的會長職務，所以我以撙節時代的社會學公共價值為題演講。Michael Burawoy和Zygmunt Bauman在理解經濟危機的政治影響這個脈絡下辯論社會學的貢獻。Stephen Ackroyd和Rosemary Batt直接處理危機的本質，探討美國和英國的經濟「金融化」問題。我們有來自24個國家的外國與會者，接受了622篇文章，其中62篇取消了發表。

在英國，撙節直接影響了大學教育系統，這也是社會學所關心的議題。許多系所因此面臨關掉或縮減的命運，並且學生申請大學的人數會減少，因此也直接減少了就讀大學的人數，也會讓學生選擇實用導向的科系。在Strathclyde University的社會系就關了，其他學校也發現越來越少人申請社會系，有的甚至驟降。另一方面，其他科系的申請人數則是增加，甚至暴增。現在評估撙節的影響可能還言之過早，不過我們會持續注意。

撙節對社會學的影響不盡相同，可是情況很明顯。我們的2012年會議中就強調了兩個正面影響。撙節重新喚起了英國社會學的階級分析，平衡了文化轉向後的社會學氛圍，並讓大家更積極參與BSA。若我過於強調後者，還請見諒。當學科分化並且在各個學科中都是如此的脈絡下，現在社會學家似乎用BSA在鞏固自身的專業認同。隨著單一主題系所的消失，少數教師和研究員散佈各地的行政職，並把BSA視為是傳統系所的結構一樣，用讀書會取代系所演講，然後BSA自己成為專業認同的焦點所在。BSA的侯任理事長John Holmwood已經讓這個主題成為社會學的必要課題，而且BSA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 ■

> 橫濱大會：促進世界平等的橋樑

by 長谷川公一, 東北大學, 仙台, 2014日本橫濱世界大會年在地籌備委員會主席

從Pacifico遠眺橫濱大橋

日本社會學會長長谷川公一在去年5月組織了一個網絡，處理討論了3月海嘯災害的相關研究和資訊。這個網絡現在有150人之多。那次的地震、海嘯、核災引起了社會學界的注意和研究，包括了在危險地區的大規模訪問。

> 社會學的挑戰

面對這樣的災害，社會學的任務和角色為何呢？這樣的艱困情況下我們又要怎麼進行問卷調查？我們要怎麼和災民建立出有意義的對話，又如何才可以協助他們？截至目前為

>>

止，仍然還有360,000 人無家可歸。這些人現在都住在臨時屋裡。在福島，還有150,000人因為政府命令或是自己選擇不要回家。

我們正在處理微觀、中層、巨觀的各種問題，像是，科技與社會、政治的關係，都市規劃、重建，恢復農業，耕種、捕魚，創造就業機會等等；NGO則處理老人的照護。 我們也關心小孩，還有那些失去親人、朋友、房子的人；此外還有酗酒、暴力等的議題，並且還有性別議題。這些就像是一場社會學的戲劇，有男女主角。

> 日本的女性反核佔領運動

許多人非常擔心福島核電廠的情況。不過目前是蠻穩定的。在方圓30公里內的區域，包括東京、橫濱、仙台，輻射值都在安全範圍內。我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會帶著一個儀器測輻射。災難發生後，我一直很推薦大家一本書：邁向後核能社會。

女性在這次災難後非常批評東電和政府。因為女性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她們要求全部賠償她們和小孩的損失。她們每個星期幾乎都會舉辦大型的集會、演講、以及研討會。從9月過後，也就是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日本女性和平地佔領了經濟和工業部，因為大家認為這個部門要替核災負起責任。雖然政府和警察因為怕引起群眾暴動，未採取強制驅離，但是抗議的女性仍然不願離開。

> 連結分隔的社會

在311災難發生後，橫濱市立即檢視了該地的海嘯歷史，並且依據300年來小海嘯的紀錄更新的防災準則。在地籌委會、日本社會學會、ISA一起為世界大會作準備，希望可以吸引和歌德堡一樣超過5000人的參與盛況。我們將邀請全球的社會學家起到橫濱體驗強韌的災後日本社會。

從會議地Pacifico我們可以看到橫濱大橋。這是該地的地標。如德國社會學家Georg Simmel所說：橋是我們連結意志的視覺表現。我相信社會學可以連結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過去和未來、男性和女性、自然和社會。橫濱正等著各位一起來跨越這座橋樑！ ■

> 義大利的大學，拍賣中

by Laura Corradi, University of Calabria, 義大利

「我是無業遊民」：Precariat成為新貧階級

義大利的大學快生存不下去了，因為已經病入膏肓，並且快被淘汰了。我想義大利的例子絕對是史無前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如今財務卻非常吃緊。跟其他的工業化國家比起來，義大利的大學的資金少得可憐。人文與社會科學等學科更是如此，預算不斷被刪，因為政府認為應該要把錢花在經濟和市場投資上。無獨有偶，整個歐洲似乎都面臨到相同的問題。大學的課程若要獲得編列預算的支持，那必須是被認為有市場價值，否則沒人會理你。」以上這段話是從兩位義大利學者Piero Bevilacqua和Angelo所撰寫的文章「D' Orsi, L' Università che vogliamo」(我們想要的大學)中節錄出來的。這篇文章並有上百位的義大利教授、學者、以及臨時教師或學者(precari)所連署。

2010年義大利就有126,188名臨時教師學者(precari)：41,349名約聘教授、24,934醫學院實習生、23,996名輔導老師、以及17,942名研究助理。整體來說2010年還比2008年少了22,000人1，這代表了義大利大學的分崩離析，越來越沒希望，且越來越私有化。

而義大利大學中的貪污現象—這是不可否認的也很可恥的一件事情—則被用來當作抨擊公立大學成效不彰的把柄，並且制訂了許多糟糕的法律，像是惡名昭彰的Gelmini Reform—以Berlusconi政府的教育、大學、與研究部部長的名字來取名的。

這個改革法案是在預算刪減的前提下制訂的，並把權力

>>

全部給了校長和正教授。另外，這個法案也傷害了大學自治的民主基礎，裁撤了教師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給予教師有參與決策的機會)，然後使得學術議會的功能幾乎喪失。

另外一個讓義大利的大學重傷的是廢除公立學校文憑的法律價值。這讓學生不想念公立大學，特別是那些繳不起高額學費的學生們。這樣一來使得公立大學和其他的私立大學或是獻上大學變得沒有兩樣。

1968-1977年的學運是以那些通勤學生、在職學生等為主，運動訴求強調他們的利益與需求。而90年代的學運則是反對教育私有化，反對知識生產是為經濟利益服務，像是La Pantera (The Panther) 運動。在2000年，新的運動開始萌芽，特別是在Berlinguer Reform之後。這個改革法案由「進步政府」所提出，要求大學的財務自主和減少政府補助，這樣一來讓大學和企業之間更加密不可分。

這個改革法案一伴隨著2011年佔領Rome University La Sapienza運動一證明了新自由主義是不分黨派的共同神主牌。公立大學的私有化政策亦然，不論是中間偏左派或中間偏右派政黨皆是如此。刪減預算讓學生福利縮減，獎學金變少，學費飆漲。這些激起了一波一波的學生抗議浪潮。2008年的運動L'Onda (The Wave)就是有一群副教授和研究員罷課。最後，這個運動也處理了學術臨時工(precari)的議題。這些人只做全職的工作量卻領半職的薪水，這種現象我們稱之為lumpen-ricercariat。這也讓當今各個職業的學術工作者一起集結起來發聲。

而今我們都期待著「二次六八學運」的到來，意味著希望這波運動終究會成功。然而最有可能的狀況是這波抗議會促成與其他社運的結盟，一起對抗危機。可以和失業勞工運動結盟，也可以和indignados 運動結盟，反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強迫式經濟成長。這些擁有共同問題根源的不同社運若彼此結盟，那麼未來是充滿希望的。例如像是在2012年3月30日在Rome的全國大規模示威抗議，以及5月16-19日的Frankfurt的國際社運動員，都是很好的例子。

更多抗議運動的相關資訊可以到：http://www.ateneinrivolta.org/ (Universities in Revolt)。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各種文件、計畫、報告、影像、資訊。性別議題也是重點，因為自從女性在大學裡面被歧視之後，這就是重要的議題。政府決定刪減20億歐元的大學運算，其中對女性的影響最大，因為女性的職位都是會被這波預算刪減影響到的職位。這也會傷害到南部的學校，並且邊緣化GLBTT。

「Our future is now, life does not wait」：precariat的抗議標語

> ISA與聯合國：犯罪與刑事司法

by Rosemary Barberet,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美國

今年4月我以ISA代表的身份出席參加了在Vienna第21屆聯合國犯罪防制和刑事委員會(CCPCJ)的大會。ISA具有非政府組織諮詢的地位。我已經有參與觀察此一會議10年的經驗了，我認為，他們非常需要社會學的視野，不論是社會學或是犯罪學都可以為CCPCJ有所貢獻。

CCPCJ是經濟與社會委員會(ECOSOC)的附屬組織，成立於1992年，其所負責的議題包括了：

- 解決國家或國際犯罪的跨國行動，包括組織犯罪、經濟犯罪、洗錢，並支持推動刑法在保護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
- 都市、青少年、暴力犯罪等的防制。
- 刑事系體系中管理的效率、公平、與改善。

CCPCJ負責發展、監督、審查犯罪刑事相關的業務，提供實質和組織上的建議，每5年召開一次會議。CCPCJ是CCPCJ基金的管理者。此一基金是聯合國所提供給聯合國藥物與犯罪辦公室(UNODC)用來推動犯罪防制和刑法。CCPCJ由40個ECOSOC會員國中選出的代表負責主持，任期3年。

CCPCJ是由聯合國犯罪防制與刑法專案網絡所支持。此一網絡由跨地區的國家所組成，支持聯合國相關業務的推動(例如在網絡中的聯合國國家法律部門)。

每次會議都會有一個主題。今年是「針對移民、移工、及其家屬的暴力」。這個主題來自於薩爾瓦多宣言，其是在2010聯合國犯罪大會之後所提出，由土耳其所建議。這個主題相當切時，因為我們會看到媒體大幅報導中美洲墨西哥移民被警察遣返或是被黑幫挾持綁架，在Arizona沙漠中死亡，法國極右派Marine Le Pen的反移民言論、以及阿拉伯革命的中東和北非移民等的新聞。主題是交互相關的，因為這也和聯合國負責處理移民毒品走私的部門有關，也和其他人權相關業務有關。雖說大多數都在討論犯罪，可是François Crépeau (一位Special Rapporteur)也說人口走私也可能是在

>>

保護人權。他以電影Casablanca為例去說明人口走私的正面部分。不過，我們還是要問：社會學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們對於ISA該在聯合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個問題上經驗豐富，以提供給執行委員會或會員研究的參考。儘管ECOSOC和UNODC皆強調證據的重要性，不過由這兩個單位所提供的研究卻日益減少。3年來，ISA在會議中提供了文獻回顧的部分，而ISA也要知道這部份的學術知識並不符合公眾的需要，所以做出讓公眾可讀可理解的研究是相當關鍵的。我們的文獻回顧提供客觀的知識基礎，從社會學的角度定義和解決問題，並希望可以減少不同知識的落差。

那麼，若要能讓公眾理解，對ISA來說挑戰是什麼呢？聯合國在提供給NGO資訊這點上非常保留，只可以提供那些由秘書處核准的資訊。他們也直接以口述方式提供。可是，聯合國在決策上向來不透明。雖然會在公開會議中討論議題，可是決策都在非正式場合理完成，NGO總是不得其門而入。NGO也不在mail-list中，這對訊息傳播很不方面。而聯合國代表也對NGO的出版不感興趣。具有諮詢資格的NGO通常是議題和運動導向的組織，不向ISA有科學研究的基礎。再者，在缺乏對話的前提下，資訊的流通只能靠會員國的好意了。雖然我們的文件都有英文和法文的版本，不過若可以有所有聯合國的語言，那是最理想的。

CCPJC是聯合國中負責犯罪刑事相關的主要組織，促使會員國同意減少犯罪的目標，若有社會學的協助，這個目標將會更快達成。 ■

> 對編輯ISA的eSymposium感興趣嗎？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國, ISA出版副會長, 2010-2014

相信ISA的會員們都知道從2005年開始我們由Vineeta Sinha編輯了一份線上的電子刊物，叫做ISA E-Bulletin。他最近要改名叫做eSymposium了。這樣的轉變將會帶來更多的討論和互動，也會有更多非文字的影像或是影音檔案放到線上。例如，最近一期由Zaheer Baber張貼的「Occupy Toronto: a photo essay」就是最好的例子。

Vineeta認為既然我們有了新的系統，那麼這剛好是一個絕佳的時機去找到一位接任她的新編輯了。這個新刊物已經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在上面了，，相信未來會更加繽紛豐富。你/妳或許對這份工作有興趣，或是認識任何你/妳覺得會有興趣的人嗎？新的編輯將會在2013年的7月上任。請上ISA網站看看如何申請這份有趣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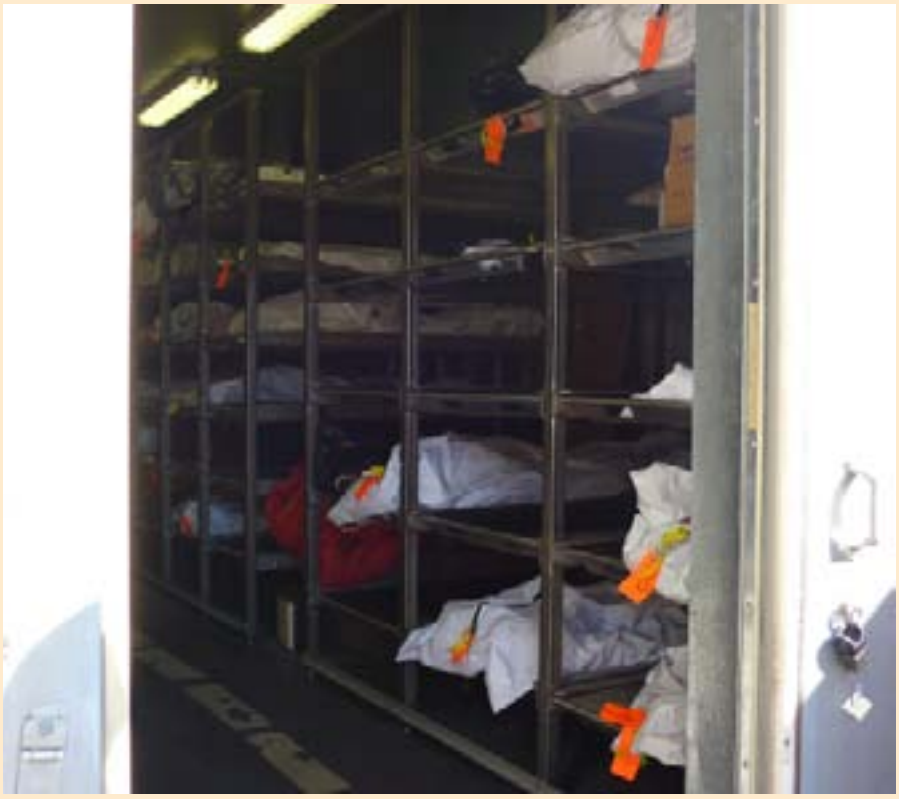
> Arizona沙漠：移民的死亡陷阱

by Emine Fidan Elciogl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當我聽到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我拔腿跑開、開始反胃嘔吐。屍體腐爛的惡臭在我身上揮之不去。我所拍到的照片是在Tucson的Medical Examiner’s Office中的冷凍屍體。白色的塑膠袋中裝滿了屍體殘骸，男人、女人、小孩，他們都是要偷度到美國，卻在死亡沙漠中喪生的人。

照片也捕捉到了州政府和這些不受歡迎人口(無論是生是死)的互動。自從90年代末執行邊界的強硬政策，那些無證的移民被迫離開都市，逃到這個與世隔絕的沙漠。若這些移民想要在美國生存下來，那其實還是被「囚禁」著，下場不是被逮捕就是死在沙漠裡。同時，他們在美國永遠是非法移民，隨時會被遣返，家庭隨時會被拆散。

不過，只要他們一旦死了，州政府就會讓他們永遠留在美國。他們的屍體會被Border Patrol以四輪的車子送到Medical Examiner’s Office。在那裡，



個人物品會被妥善收好用以辨識身份，木乃伊化的皮膚被用來做紅外線標記用，牙齒和骨骼用來檢查是否可作為手術移植用。任何相關資訊都會被送到領事館或是人權組織，讓其家屬可以處理後事。同時，屍體也清楚標示著「John」或是「Jane Doe」，有時是「John/Jane Doe」，因為屍體已經難以辨識其性別。所有屍體都放在冷凍櫃中。州政府願意花大把銀子運送屍體、處理、保存，並由簽約的殯葬業者處理遺體、埋葬在公有墓園中。可是，州政府從未想過要花任何一毛錢去防止這種悲劇的發生。■